学术专论

清末计学馆与户部、度支部司员教育

徐保安

[摘要] 清末计学馆成立于1904年11月7日，是户部（及其后身度支部）教育本部司员的署内学堂，以“讲求部务、研究实学”为宗旨。该馆要求司员熟习例案以渐收胥吏之权，同时研究实学开启官智。具体运行过程中，计学馆在功课开展、经费筹措等问题上波折不断。1906年后，计学馆逐步走向正规化办学，并最终让位于财政学堂。计学馆及受其影响成立的中央各部学馆，与仕学馆、进士馆、课吏馆一起构成了清末官员教育学堂体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堂兴起、西学传播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认真梳理计学馆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向近现代社会艰难演变的复杂历史进程。

[关键词] 计学馆 清末新政 司员教育 户部 度支部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6－0145－011

1904年11月7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户部新设之计学馆开学，120名户部官员齐集一处，聆听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演说：

> 我中国时事日亟，朝廷需才孔殷，但现在有学而不用，有用而无学。诸君！诸君！若徒在本部之例案堆中何能考求经济？方今财政之学为当务之急，而财政一道非由算术进门不可。予之特设计学馆，先重算学而后研习专门。惟望诸君虚心好学，切实讲求，幸勿为御史添折本而为报馆添材料也。勉之勉之，有厚望焉。[①]

从《北洋官报》披露的这段话来看，计学馆是为了解决户部司员“学用不一”状况而设立的教育培训机构。赵尔巽对户部官员“有学而不用，有用而无学”的状况十分不满，也不认可仅靠户部积久形成的例案就可以考求经济，讲求财政的做法，要求司员重新学习财政专门知识，入门路径则是“算术”。赵尔巽谆谆教诲，希望计学馆设立不要“为御史添折本而为报馆添材料”。

计学馆成立后，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报道，户部内第一次招生就有120人入学肄业。可见，从户部高层到一般司员，再到舆论媒体，都对计学馆的成立给予了高度关注。那么，计学馆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得以设立？具体运转情况如何？效果怎样？对当时政制改革与政治演化有

[收稿日期] 2024−12−11
[作者简介] 徐保安（1979— ）男，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无锡214122，xbanq2009@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季开官智研究”（20FZSB015）阶段性成果。

① 《计学馆开学演说》,《北洋官报》1904年第467期，第3页,《畿辅近事》。

何影响？对此，学界揭示稍显薄弱。① 本文通过梳理档案、报刊以及当事人相关资料，试对此问题做一梳理与解读。

一、"讲求部务、研究实学"：计学馆的开办缘起

1904 年 10 月 29 日，计学馆开学之前，《户部计学馆章程》（下文称《章程》）通过媒体公之于众。《章程》指出计学馆宗旨为"讲求部务、研究实学"。这两条宗旨恰代表了计学馆开办的两条背景线索。一条是清末新政初期开始的部务整顿；一条是晚清以来逐渐兴起的所谓"开官智"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批旨在以"实学"教育在职官员的特殊学堂得以创建，计学馆正是其中之一。

庚子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初，如何提高官员素质的问题引起了颇多关注。在各界提出的诸多举措中，整顿部务、裁汰书吏，要求官员亲自办理政务成为选项之一。晚清以来，针对书吏之害，有识之士屡有建言，但积重难返。庚子之乱中，京师各衙门案卷迭遭兵燹，"荡然无存"。1901 年 5 月 20 日，御史陈璧奏请借此机会一举裁汰书吏，删减例案，要求各衙门司员亲自经理，以杜弊端。陈璧奏折引起了朝廷高度关注，上谕同意陈折意见，要求"京师、行在六部各衙门堂官，按照所陈办法，均责成各司员亲自经理例案，不准再行假手书吏"。② 随后，清廷于 5 月 30 日、6 月 1 日、2 日连发上谕，指出"六部为天下政事之根本"，"当变通政治之初，亟应首先整顿部务，为正本清源之道"。京师各衙门如此，各省府州县地方衙门亦要清理例行档案，删繁就简，裁汰书吏，"无论大小衙门事必躬亲"，书吏只供抄写，不得假以事权。③

严旨催促之下，各部院衙门开始整顿部务，变通政治。率先提出整顿之策的是作为"储才重地"的翰林院。6 月 4 日，掌院学士孙家鼐要求改革庶吉士学习制度，将研读经史诗赋改为"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此处"政治"是指"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所谓"洋务"是"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即使庶吉士授职以后，仍要"随时札记所学"。孙家鼐对学习内容的限定以实际政务需要为标准，所谓"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④ 次日，上谕基本接受了孙家鼐建议，要求翰林院编修、检讨以上官员专课政治之学，并旁涉洋务之学，皆要"讲求实学，通达古今，以备朝廷任使"。⑤

1902 年 1 月 10 日，上谕再次要求翰林切实讲求"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以"体用兼赅，通知时事"，成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并旨令"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⑥2 月 24 日，督办政务处奏请将翰林院整顿之法予以推广。奏折认为，不仅翰林院需要严行甄别翰林各官，

---

① 尚未见对于计学馆的专门研究成果。部分论著在涉及相关人物或事件时对其略有提及。如对唐宗愈的人物传记描述中，后人多采用唐文治说法："至其出而仕也，始以主事签分户部，入仕学馆，襄办户部计学馆，充教习。"（唐文治：《茹经堂文集》4 编卷 7"传记类"第 241 页，《民国丛书》第 5 编 95 综合类，上海书店，1996 年）关晓红在分析学部与各部所办学堂业务管辖权限争夺时，对计学馆有所介绍。（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40–245 页）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 年，第 346 页）亦有简单涉及。成果大多点到为止，缺乏进一步的介绍与分析。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中华书局，1958 年，第总 4662–4664 页。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李秀清等点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 1 卷，"谕旨"，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4 页。另，5 月 30 日（四月十三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第总 4666 页），《徐兆玮日记》（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黄山书社 2013 年，第 300 页），应为 5 月 28 日（四月十一日，丙午）。

④《军机处录副奏片》，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光绪二十七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3-7203-127。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2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81 页。

⑥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第总 4798 页。

京师各衙门司员以及各省候补官员均积习极深，“一旦派差，诸事茫然”。裁汰书吏之所以屡推不动，就是因为各衙门司员“能通达部务，见事明决，不假手吏胥者，实不多觏”。奏请饬下各将军督抚一体设立“课吏馆”，对省内官员严加考核与教育；京师“各部院堂官即于该衙门内择一宽敞房屋为司员讲习公所”，凡无差事人员“不分满、汉及笔帖式均令到署肄习，互相讨论，或令拟奏咨稿件，或策问本部例案，遇有酌议事件先令各具说帖，由堂官细心考核，择其尤者酌派要差，不拘资格”。未派要差者即令分管案卷，潜心考究。他们认为“果能照此整顿，司员皆亲身治事，书吏自不能蒙蔽揽权”。① 奏折中所提各衙门“择一宽敞房屋”作为司员学习之地的建议，成为后来各部院建立学馆的政策依据。

3 月 6 日，翰林院奏明院内人员用功办法四条：严定课程、酌派人员、调取书籍与筹建堂舍。其中，第四条“筹建堂舍”颇引人注目。此主张为掌院学士孙家鼐于戊戌时期创建大学堂的政策延续，“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认为教习已仕人员、已成之才，比教未成之才收效尤速。奏折称拟于翰林院设“讲习堂一区”，分设两斋为各员修业之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讲习堂”是专为编修、检讨以上官员“用功”之所，与庶吉士学习之庶常馆“体制不同”。②

正在各部院整顿部务之时，“开官智”呼声不断兴起，让在职官员接受实学再教育渐成潮流。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于 1902 年 2 月 13 日上折，提出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两门：仕学馆与师范馆。当天得旨允准。仕学馆招考对象即官员群体，于 12 月 17 日开学。此前，12 月 1 日，清廷颁谕提出自次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③ 此谕促成了进士馆的设立。进士馆与庶常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教育对象不仅有庶吉士，还包括部属中书。1904 年 5 月，进士馆开学，运行不久人们即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部属中书究竟应该回归各部学习实际政务为主，还是留在进士馆接受政治通识为主？ 7 月，御史张元奇奏请更定《进士馆章程》，政务处随即奏定新章，指出六部各有职掌，“兵刑农工诸大政，皆属专门之学，并须分类考求。现当整饬部务之时，方拟各开学馆以待通才”。④ 该折直接促成了各部学馆的建立。政务处奏折于 9 月 26 日获准后不久，户部便于衙内设立计学馆一所，遂有本文开头一幕出现。

计学馆的设立，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应为最主要推动者。当时，户部满尚书荣庆对于计学馆态度很不明朗。荣庆日记中自九月十七日至十月初三日失记。计学馆开学的十月初一日，荣庆只字未写，后来似乎亦未提及此事。⑤

由上所述，计学馆的开办背景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新政之初，由御史陈璧提出、清政府大力推行的部务整顿线索；另一条是清季官员接受新学、实学再教育的“开官智”线索。但从赵尔巽演说来看，赵氏并不认可部务整理中强调司员练习例案的做法，而更倾向于晚清各界倡导的以西学、实学等“新知”重新教育官员的思路。

二、功课设置

户部计学馆《章程》强调以“讲求部务、研究实学”为宗旨，馆内功课基本围绕此宗旨而设，所谓“计学为专门绝诣，尤不可不切磋讲习以期致用”。《章程》规定计学馆功课分“札记、听讲两门”。札记为“自作”：“司员每日上堂看书看卷，准其各认专门，自作札记。”对札记的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政务处王大臣奕劻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档案号：03-5411-082。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冈、孙家鼐，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3-7175-008。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李秀清等点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 1 卷，第 17 页。

④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韩君玲等点校：《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 3 卷，第 378 页。

⑤ 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6-77 页。

评判是“量其见识之高下，而殿最之”。听讲则有明确课程安排：“专听教习演讲‘财政通论’及‘各国财政沿革’‘银行货币’等”。札记、听讲两门以外，另设“专修科”一门，聘请教习讲授算学、各国语言文字等，司员自愿选修。《章程》强调户部衙门为学员储存各种参考书及各房各司案卷，供学员研究学习之用。[①] 可以看出，计学馆课程确是在围绕户部业务进行设置。其中“札记”主要为学习部内案卷并记录心得，其体现的是清末部务整顿线索。“听讲”主要是随教习学习算学、法律以及外语，体现的是令官员学习新知的“开官智”线索。然而，以上规定似乎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一）札记问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赵尔巽档案》（下文称《赵档》）中有一份日期标注为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的文件，即计学馆运行一月后形成的文献。在此文件中，贵州司员外郎恒年向赵尔巽呈文抱怨“欲办本司札记有阻格难行之处”。作札记本应翻阅案卷，如贵州司掌印司员傅兰泰言：“愿办札记者非检本司案卷不可，是必先阅案卷，然后佐以论断方有札记。”但贵州司其他官员对此并不认可，如正稿王育梁认为“办札记不必阅本司案卷，能言署中之事即是札记”，且言贵州司案卷无可论断之处。贵州司选择办札记者共十余人，除恒年外，大多认可王育梁说法。无人配合，恒年根本无法看到案卷。恒年认为此举“谬妄欺人”，不结合案卷作札记实为作“无题之文”，无从着手。恒年不理解为何贵州司案卷如此“秘密”。[②]

至于恒年为何会受到刁难，《赵档》中有一份时间不详的手写体文件或能说明问题。从内容来看，此件应该是赵尔巽请人代为调查部内司员札记完成情况的回复。该调查者发现，户部“总办某公，见札记有直言无隐者，勒令追回另改，并劝令札记者，仅可勉强敷衍，毋庸过激，且告以有作札记一二次之后即可告退云云。似此蒙蔽营私，尚复成何政体”？与计学馆“令各员作札记，原欲实举利弊”之意图背离太远。调查者还发现札记做完后无人收卷，即便有收卷之所，也“须先令该总办过目。见有稍形激烈者即劝令删改，且云勉强敷衍二次后即可告退，是真不值一噱也”。[③] 这份文字资料应为调查人给赵尔巽的私人信件，内容应比较可信。信中所提“总办”应该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想让各位司员对部内事务随意发表意见。如此学习氛围，恒年所遇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自然导致札记的空疏无用，以至于江南司主事高增荣上书赵尔巽，要求停止札记恢复编案。高增荣认为札记徒托空言毫无实济，莫如恢复旧有之编案工作，将其分门别类各赘弁言，呈堂鉴阅，一经评定，即以某员所编案宗之办法，永著为定例。盖编案实事而札记空言也，故请停止札记接办编案以期随时改良。[④] 让司员放弃札记从事编案工作，仍是部务整顿思路，由官员代替书吏从事部内具体业务，等于又退回到计学馆成立之前的状态。

札记的问题并不仅止于此。与听讲不同，札记“专指部务而言”，但学习部务自然要调取本司案卷，且要请教司内前辈，“此皆须在本司方能办理，断无远赴学馆查案之理”。故户部强调设于三库大堂的计学馆，是专为听讲而设，即听讲完毕后，各司员仍应回本司退而自修。亦即说，札记虽属于计学馆功课，但并不能在馆内完成，这导致各司在札记问题上往往自行其是。在无统一规划且多数司员并不积极的情况下，如恒年一般认真办札记者，自然会遇到调阅案卷不便的问题。对此，户部给予了解释，并提出增加人手以专管案卷调阅的解决办法：“目前委派总办、帮办，皆为其略明科学专备照料开馆办法，尚未议及札记办法。查各司不乏老成谙练人员，惟皆因本司公务繁多，罕能分身，兹择本司事简者，并加派刘岳云、曾习经为计学馆总办，

---

① 《户部计学馆章程》，《大公报》，1904 年 10 月 29 日，第 2–3 版，《专件》。

② 《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③ 《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④ 《请停札记办编案》，《时报》，1905 年 1 月 26 日，第 229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

专管照料各司札记一门，编案查案列表即包其内。龙殿章仍一同帮办札记列表各事。其各负调阅本司案卷咨询始末，即由各本司印稿帮同照料，毋庸签派，切勿稍分畛域。是为至要。”①

另外，《章程》也注意到了学习与政事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户部如有应拟稿件须集思广益时，由堂官发问，令司员各拟一篇呈交备采，并评定优劣，将分数计入札记门中。

（二）听讲与教习

《章程》规定，计学馆每日功课分为早、晚两班，早班 8 点至 12 点，晚班午后 1 点至 5 点。各 4 小时，其中札记 2 小时、听讲 2 小时。专修科内分算学 1 小时、语言文字 1 小时。② 不久，赵尔巽又修订了计学馆课程：每日上午 9 点至 10 点讲财政学，10 点至 11 点讲银行学及日文；11 点至 12 点甲班算学，12 点至下午 1 点乙班算学，下午 1 点至 2 点讲英文。2 点至 3 点讲俄文，3 点至 4 点讲货币，4 点至 5 点讲理财法律学。③

此时间规定看起来非常整齐，但恰恰成为问题所在。试想，一个户部司员，如果完整参加 8 小时馆内功课，部内业务何时处理？《赵档》中有一残件给出了答案：“计学馆本系以仕为学，势不可荒弃职守，是以现分早午两班（即半日学堂之意——原档注），使之截然不混，俾可仍以半日学习半日公事，不致两歧。即各人私事亦不致无暇办理。”具体做法是：“早班者可于午后办理本司公事，午班者自应于午前办理本司公事。但本部向来早衙无人，若今午班者早间办事书吏全然不到，即调阅查问各事必至无人承应，亟应传付各司书吏，早间亦须有人承应一切，毋许违误。”不过，“若学员自愿早午两班皆在学馆，亦听其便”。④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其意思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章程》规定的课时安排；第二，司员调阅案卷，查问各事，仍需要书吏帮助，书吏不到则无从措手，表明自新政开始以来进行的裁汰书吏举措，成效不大。

计学馆札记属于自修，体现的是“部务整顿”思路，目的是让司员通过翻检例案熟悉传统业务。相对而言，“听讲”则更具有新式学堂的影子。按照《章程》规定，“听讲”是“专听教习演讲财政通论及各国财政沿革、银行货币等事”。另外，计学馆在札记、听讲之外设“专修科”一门，“聘请教习教授算学及各国语言文字，不愿习者听”。⑤ 可见，所谓“专修科”类似于选修课或“随意科”，可自愿选择听或不听。《章程》曾指出教习亦为户部官员，“皆系同寅，原不肯自居师位”，彼此“互换智识”，遇有疑难“应和平辩论”。但又提到对于专修科而言，需要“聘请教习”。这说明计学馆教习群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部内业务精通的官员前辈，主要负责在札记和户部业务上对学员进行指导；一类是外聘专家，负责教习近代财政法律、算学测量与各国语言文字等“实学”新知。

计学馆成立之初，《章程》曾声明“现在教习有财政、法律、算法、测量、英文、俄文、日文各员”，要求司员“愿习何门应先赴北档房报明”。但实际上似乎并未开满所有课程。按照《时报》披露的消息，计学馆开学初教习共有六员，计开课程如下：日文、专门财政：王宰善、谭德基；英文：王葆桢；俄文：萨荫图。以上四位教习均兼算学教习。另有财政普通教习：唐宗愈、蒋棻。教习薪金除王宰善、谭德基由外省延请月俸百两外，其余均按月 30 两。⑥《时报》这段材料透露出的两个信息值得注意。第一，计学馆教习并非全为本部官员，亦有外请，如王

① 《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另见《计学馆添派专员》，《时报》1904 年 11 月 22 日，第 164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

② 《户部计学馆章程》，《大公报》1904 年 10 月 29 日，第 2–3 版，《专件》。

③ 《计学馆重定课程》，《北洋官报》1904 年第 529 期，第 5 页，《畿辅近事》。

④ 此处档案中用墨笔划掉一句话：“盖各员已入仕途。”《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⑤ 《户部计学馆章程》，《大公报》1904 年 10 月 29 日，第 2–3 版，《专件》。

⑥ 《记户部计学馆》，《时报》19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60 号，第 6 版，《学界纪闻》。另：《计学馆调用教员》（《北洋官报》，1904 年第 479 期，第 4 页，《畿辅近事》）一文记载唐宗愈、蒋棻在计学馆分授英文、经济两科，考虑到唐宗愈的专业，此记载应不确。

宰善、谭德基。其余四人均有户部郎中、主事或候补主事身份。第二，计学馆很注重教习的新式教育背景，6 名教习中，萨荫图是京师同文馆优秀毕业生，王宰善为日本留学毕业生。王葆桢、唐宗愈、蒋棻均为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员。[①] 至于《章程》所提到的“法律”一科未能开课的原因，王宰善在第一次讲课时有所揭示：“户部奏设计学馆，堂宪本意专重财政一门。夫学习财政非讲求法律不可，但法律之学在我国颇不易行，盖非立宪虽学无益。今日诸君学习财政，请先从算术入门可也。”[②]

（三）功课调整

此后，计学馆课程又有扩充与调整。1904 年底，户部筹备开设户部银行，因人才缺乏，赵尔巽要求计学馆增加“银行科”一门，教习王宰善。[③]

1905 年 5 月 7 日，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吏部尚书张百熙调署户部。大致在此前后，计学馆进行扩充，增设了专教部内满员笔帖式的课程。课程共计 6 门，其中包括 4 种专门课程：拟稿、抄奏、点报、读书；2 种普通课程：习算、检案。“拟稿”目的为谙练部务明达事理，遇有本司奏咨稿件皆可酌拟，每二月拟一件。“抄奏”目的是使笔帖式粗通公牍兼娴楷法，分本部奏案、外省奏案为二类，不关本司者不抄。“点报”目的为让笔帖式心地明白尚有识解，愿究心内治者宜令点《阁抄汇编》之类，愿究心外交者宜令点《外交报》之类。“阁抄”则日点二折，《外交报》则日点二页，凡涉财政者宜令略附解说以觇才识。“读书”一门“以待文理未深年轻质美者”，宜取《二十四史文钞》、皇朝经世文各编言理财而简明易晓者与读，期诵习后渐可贯串文理，宜令先抄后读。普通二科为习算与检案，凡抄奏、点报、读书者皆兼此，拟稿者愿习与否，听其自便。习算科宜习珠算，遇有销册到部以期简捷。检案科，宜取本司收支发文簿，照原摘事由分类抄写各一册，使知查卷之法，将来可分书吏之任，均按每月双日呈送察阅。为教育司员及笔帖式，计学馆所购置的图书有《二十四史文钞》、皇朝经世文各编、《东华录》详本节本各 3 部，《光绪会计录》10 部，《户部则例》《通行新章》《约章辑要》《庚子新约》《商约》《各关贸易表册》《原富》《新列国》《岁计政要》等，所购置的报纸有：《阁钞汇编》《外交报》，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年《谕折汇存》《政艺通报》《顺天时报》《中华报》等著名报纸，比较注重传统学问与实学、新学的结合。[④] 由如上规定，可见户部对满员笔帖式的教育虽陈列各种新式书报，但更为注重具体业务知识，更多是在坚持“部务整顿”思路，所谓“将来可分书吏之任”即是。

同年，史学名家陈黻宸成为计学馆教习。陈氏 1903 年 7 月中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进士，授户部贵州司主事。陈黻宸长于史学，会试未中之前，讲学于各大书院：“温州陈先生者，于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史。”中式之后，张百熙等聘请其为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1905 年，阴历六月间，户部派充陈氏为计学馆教习，仍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及京师编书局编纂。[⑤] 陈氏为史学名家，在计学馆这一专业学馆中承担何种课程，殊为令人好奇。有媒体报道称其为“汉文教习”，[⑥] 倘若计学馆有讲授“汉文”之必要，亦可见户部司员知识水平之低劣。当然，此时户部尚书已由赵尔巽改为张百熙，不排除此次聘请，是非常欣赏陈黻宸的张氏，对陈氏的有意推重与提携。

---

① 徐保安：《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员的入学、分流与就业》，《北大政治学评论（第 6 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88–189 页。

② 《记计学馆教习之演说》，《时报》1904 年 11 月 29 日，第 171 号，第 6 版，《学界纪闻》。

③ 《计学馆添设银行科》，《时报》1904 年 12 月 10 日，第 182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

④ 《户部计学馆拟添汉文功课章程》，《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6 期，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教育》，第 107–108 页。

⑤ 陈谧等：《陈黻宸年谱》，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177、1193 页。

⑥ 《新派计学馆汉文教习》，《时报》1905 年 8 月 23 日，第 433 号，第 6 版，《学界纪闻》。

1906年，计学馆还曾添设笔算课，每日授课自四点至五点止。[①] 是年，户部电报处成立后，所有往返电文系调商部学生翻译。户部各堂宪诚恐假手于人，日久致滋宣泄，因饬将计学馆内添设译电一科，谆谕司员留心学习以备自行翻译而重机密。[②] 但不知教习为谁。

有资料显示，曾做过计学馆教习的还有左子兴、陆宗舆等。[③]

三、管理、运行与经费来源

计学馆成立时，总办为彭谷孙，襄办为赵世棻与龙殿章。如前文所述，计学馆成立不久因为札记纠纷，加派刘岳云、曾习经为计学馆总办，专管照料各司札记一门，龙殿章在旁协助。有资料显示，谷如墉于光绪三十年九月曾充计学馆提调。[④]

计学馆管理较为松散。功课虽有时刻规定，但并未见严格的考勤制度。衙署办学最大困难就是部内司员如何兼顾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冲突，以至于出现前文所言"半日学堂"的安排。但司员是否按时进馆读书学习，又无具体约束办法，最后只能沦为具文。因此，开办约一年后，户部尚书张百熙竟要敦迫司员入计学馆学习，强调"本部自设计学馆以来，司员就学者尚寥寥无几，现在需才孔亟，若无精通计学之人，恐难以胜任，故凡属今年到京各员，除已入仕学馆及进士馆者不计外，其余一律均应入计学馆，每日定有功课，不准规避"。[⑤]

计学馆为提高司员学习积极性，特规定有考试与奖励办法。有司员为获得奖励积极参与学习、考试，其成绩优秀者收获颇丰。在"赵档"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奖银数字单。

表1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份计学馆季考早、晚班必修科功课拟奖银数字单

85分以上	奖银10两	2人	共20两
80分以上	奖银7两	5人	共35两
70分以上	奖银4两	10人	共40两
60分以上	奖银3两	9人	共27两
50分以上	奖银2两	11人	共22两
40分以上	奖银1两	9人	共9两
			共153两

资料来源：《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另外，还有随意科拟奖银数如下。

英文：100分，奖银4两，3人，共12两；95分以上，奖银3两，3人，共9两；90分以上，奖银2两，1人，计2两。

日文：100分，奖银3两，1人，计3两；90分以上，奖银1两，16人，共16两。

俄文：80分，奖银4两，1人，计4两；70分，奖银2两，1人，计2两；60分，奖银1两，

---

① 《户部计学馆添设笔算》，《时报》1906年4月25日，第671号，第3版，《学界纪闻》。

② 《计学馆添设译电科》，《北洋官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第1056册，第7页，《京师近事》。

③ 左子兴，即左秉隆。《名誉教员》，《大公报》，1905年1月1日，第3版，《中外近事·北京》。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十五"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第225册，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90页。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另见《军机处录副奏片》，山西巡抚恩寿，档案号：03-5470-087。

⑤ 《敦迫司员入计学馆》，《时报》1905年10月14日，第485号，第6版，《杂记》。

1 人，计 1 两。

法制学拟奖银数：90 分，奖银 2 两，1 人，计 2 两；80 分，奖银 1 两，2 人，共 2 两。随意科共奖 53 两，连同必修科共奖银 206 两。

此外，英文、算学考试另有书籍奖励，如下：英文 90 分以上，奖字典各 1 部,8 人，共 8 册。算学：甲班 70 分以上、乙班 100 分，奖书各 1 部，20 人，共 20 部。①

由上可见，必修科、随意科分数最低者亦有奖励，这对于寒畯小京官而言，诱惑力不小。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经费何来？计学馆开办之初即奏明不动用户部库款，全系提用各司编案酬给司员津贴之款。此款很快告罄，计学馆即陷入“经费无着”窘境。赵尔巽与捐纳房主办黎大钧商议，拟从捐纳房这一户部“差使最优，较之各处局所不啻天渊”的部门中，抽提二成（一说是四成）饭银作为计学馆经费，遭到了黎大钧等人的极力抵制。

1905 年初，甲辰、乙巳两年之交，《时报》《申报》《新闻报》等诸多报刊对计学馆经费之事予以连番曝光，甚至跟进报道，闹得天下皆知。报纸报道总有夸大渲染与捕风捉影之处，但也不会空穴来风。各大报纸所述大同小异，赵尔巽企图以捐纳房经费补贴计学馆，遭到捐纳房一众官员的抵制。尚书强行将该提议与各堂官员会议讨论，虽无人敢直撄其锋，但在画稿时却互相推诿，以致无法形成决议。甚至左侍郎陈邦瑞公开声称，计学馆经费本应提取公项，作正开销，不应抽提公众应得之款。② 这种说法在当时背景下无异于煽动众意。此事最后应该是未能办成。赵尔巽此后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计学馆经费问题，比如动用户部“加照费”为计学馆经费。③ 甚至 4 月赵尔巽联想到自己任湖南巡抚时查知该省各学堂内皆有余款，遂与学务处商定拟向各省官立学堂之余款内酌提解部，以解计学馆经费危机。④ 此做法最后亦不了了之。5 月 7 日，赵调任盛京将军。自 1904 年 8 月 14 日至 1905 年 5 月 7 日，赵尔巽署理户部尚书不足一年。匆匆调离，是否与其在计学馆经费问题上动了部内某些群体的利益有关？我们有理由做此大胆推测。

张百熙接替赵尔巽继续署理户部尚书。计学馆经费问题以及学习效果不佳问题不断被提出，甚至有媒体不断放出声音，张百熙打算裁撤计学馆，另于进士馆中添设计学科一门，专令户部司员等学习算学及财政专门，以求实济而节靡费。⑤ 但张百熙一贯主张以实学教育在职官员，所以，计学馆的思路与张氏思想并不违背。其真实想法，陈黻宸应该比较了解。陈氏在张百熙六十大寿时作序文说：

> 计学馆者，创自今奉天将军赵公。赵公官大司农时，慎重职司，虑任此者或鲜学术不能胜，饬各司员各入学。不一年而赵公去，公继赵公后。或告公以计学馆鲜成效，徒縻经费无可用。公曰：是因噎而废食也。诸同学闻公言皆激厉思自奋，倍于昔日，计学馆亦因以骎骎有起望。夫人苦不学已久，非可责功成于一朝夕之间，因其无效而遽废之，天下尚可为与！于是益知公之所设施者远，而其所维持者大也。⑥

张百熙对陈黻宸有伯乐之功，陈氏在张百熙六十大寿时所作文无可避免有高捧嫌疑，但所谈事实应该不会错。张百熙对于计学馆是维护的。这一点《大公报》看得较准：张百熙莅任以

---

① 《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② 《计学馆经费无着》,《时报》，1905 年 1 月 6 日，第 209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提费津贴计学馆》,《申报》，1905 年 1 月 26 日，第 2 版,《消息》。《议提捐纳房公费拨入计学馆》,《添派捐纳房帮办》,《时报》1905 年 1 月 26 日，第 229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经费难提》,《新闻报》，1905 年 2 月 10 日，第 9 页,《各省新闻》。另见《赵尔巽档案》，署户部尚书赵尔巽，缩微号：75-066-0014，无页码。

③ 《改加照费为计学馆经费》,《时报》，1905 年 2 月 10 日，第 239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

④ 《拟提各省学堂余款充计学馆经费》,《时报》1905 年 4 月 7 日，第 295 号，第 6 版,《学界纪闻》。

⑤ 《张尚书拟裁计学馆》,《时报》1905 年 6 月 7 日，第 356 号，第 6 版,《政界纪闻》。《户部议裁计学馆》,《大陆》1905 年第 7 期，第 70 页,《纪事》。

⑥ 胡珠生编：《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390 页。

来，“多半因前赵尚书之办法，如银行，如财政，如计学馆，皆因之，而益加研究，益加整顿，且传谕各司员各拟整顿部务条陈，以便采择”。①张百熙并无裁撤计学馆的动机，但需要根据实际情形对其不断整顿。

四、正规化办学努力及与学部的争议

1906 年初，张百熙与铁良会同，一起整顿计学馆。2 月 4 日《北洋官报》载，铁、张两尚书会商，拟添聘仕学馆专门财政学毕业生二人到馆认真教授，凡在馆学员概不得托故擅离，以期学成之后赞襄部务。2 月 4 日是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考虑到报纸信息的延迟，意味着新年后刚开衙，两尚书即开始整顿计学馆。

派学员出洋，无疑是提高计学馆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计学馆 1905 年底即酝酿派学员出洋游历游学，但苦于经费未能成行。直到 1906 年中，户部各堂官拟由计学馆考取学员 50 名出洋学习财政，以备毕业回国，按其程度归该部从优录用，藉资整顿。与此同时，满尚书铁良与外务部会商，拟将该部计学馆毕业学生均派赴日本游历，定为每一班约 12 员，俟回国时实缺人员即量为擢用，候补人员即按原班尽先补用，其所需经费暂由该部饭银项下指拨。②

1906 年 11 月，清政府进行了官制改革，史称“丙午改制”。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同月，张百熙与铁良同时调离户部，度支部尚书为载泽。计学馆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计学馆创办之初，无学制体系，无年度进阶，无考选入学，自然也无毕业概念。虽有考试与奖励，并有部堂官的严厉催促，学习行为却始终依赖司员自觉，无相应制度约束。此时的计学馆只能算是一个聚而学习讨论之所，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新式教育机构。载泽上任伊始，即决定整顿计学馆改习财政专门一科，通饬司员轮流肄习以期有裨实用。③不久，度支部又拟添设财政研究所，创建财政学堂。此时计学馆地位略显尴尬，将其裁掉的传言再度传开。

但载泽并未裁撤计学馆，且于 1907 年初拟定计学馆规则九章，“甚属严正”。我们未能看到此九项规则，从媒体报道来看，其将计学馆分为内外两班，考选入学。内班以 40 名为定额，外班不拘定数，视座位之多寡为限，二年毕业，择其优等给予异常奖励。④这样一来，计学馆已经具备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大多特征：考选、班额、毕业、奖励等等，已开始逐渐走向正规化发展道路。自此，计学馆学员不再大水漫灌，而是考选入学。第一次考选是在 1907 年 4 月 20 日，内外班共取计 67 名，于 5 月 20 日正式上课。⑤

另一方面，度支部财政学堂的开办也在不断推进中。在时人看来财政学堂是由计学馆扩充而来。1909 年，财政学堂竣工，令计学馆裁撤或直接并入财政学堂的声音再度出现。财政学堂办学性质完全不同于计学馆。前者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后者仅是一培训机关。财政学堂主要招取中等毕业学生，同时开设别科，专选京外候补候选人员及举贡学有根底者，在堂学习财政各学，三年毕业。⑥这样一来，计学馆学员进入财政学堂别科继续学习，倒也十分顺畅。8 月 11 日《新闻报》总结了计学馆的不堪：“开办以来，以该部司员官场习气太深故随意上班，随意停课，殊难收效”，接着报道载泽决意将“计学馆裁去，所有在馆肄业之部员统归入财政学堂速成甲班

---

① 《户部最新政策》,《大公报》1905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时事要闻》。

② 《拟派计学馆员东游》,《大公报》1906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要闻》。

③ 《议定改设财政专修科》,《大公报》1907 年 12 月 29 日，第 5 版,《时事・北京》。

④ 《计学馆改定章程》,《北洋官报》1907 年 4 月 19 日，第 1335 期,《新闻录要・学务》，第 8 页。

⑤ 《学员入馆》,《大公报》1907 年 5 月 21 日，第 4 版,《时事・北京》。

⑥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82−283 页。

内学习，毕业后最优等者予以优保”。[①]

1909 年阴历五月，计学馆第一批考选入学学生学满两年，经考试毕业。只是，这批学员入学时为 67 名，毕业时仅有 29 名，其名次如下：温肇祥、林瑞祺、韩鼎勋、彭端、全广、张国威、贺朝元、章毓椿、魏颂唐、李炳堃、左景亮、梁念慈、振澜、冠辅仁、国瑛、俞恩荣、锐祉、文郁、李寿延、志春、张赓麟、贵德、书泰、延寿、文森、明瑞、尚久溶、文光、钟琦。[②]

但是，正是计学馆不断走向正规化、学制化，甚至要与财政学堂合并办学的时候，度支部所为触动了学部利益。学部成立后，有关各部所建学校之归属成为问题，学部对这些部门学校有无管辖权的问题让人头痛。对这一问题，关晓红曾做过相当精彩细致的研究，[③] 本文不再赘述。

五、结语

清末计学馆宗旨是“讲求部务、研究实学”。前者目的是为了让司员熟习例案以渐收胥吏之权；后者则是对清季要求官员学习新学、实学即“开官智”潮流的因应。两条宗旨所对应的计学馆功课设置分别为札记与听讲。札记自然是对本部业务的熟习与研究，听讲则是涉猎更多的知识范畴。从计学馆所安排的课程来看，财政、经济学为当然重点科目，算术、法律、外文甚至汉文课皆有设置，学习内容更是兼容传统与近代、涵括中学与西学，可以概括为以部门业务知识为主，兼及相关学科常识。教习多数有户部（度支部）官员身份，且具有新式学堂（如唐宗愈、王葆桢、蒋棻等）或日本留学（如陆宗舆、王宰善等）的相关经历，所学已非户部传统业务可比。

计学馆的成立引起了其他各部效仿，工部艺学馆、兵部兵学馆、吏部吏治馆与学治馆、刑部法律学堂与大理院裁判学馆等先后成立，这些部门学馆连同计学馆，与京师仕学馆、进士馆，以及各省课吏馆，一起构成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官员教育学堂体系。这类学堂独立于清末学制体系以外，上下也并无统属关系，基本各自发展，大致相当于临时性的具有职业培训性质的机关。但若联系当时废科举兴学堂的大背景来看，计学馆采取的“聚而学习”的形式，尤其后来考选入学、两年毕业等对新式学堂的刻意模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为官之人都要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一般士子更无抵制学堂的理由。计学馆学习内容包括传统业务，亦包括西学、实学，对西学的传播与推广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计学馆成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大媒体持续关注计学馆一举一动，相关报道连篇累牍。细究这些报道，有时会出现在《学界纪闻》，有时出现在《政界纪闻》。看来当时媒体人也不太好界定计学馆一类学馆，究竟属于“学”还是属于“政”。其具有一定的新式学堂特点，同时又与政治事务息息相关。我们目前未能找到充足的资料证明计学馆培养效果究竟如何，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即学馆对传统具体业务与专门行政知识的讲授，在一定意义上，或者在无意中，进行了培养所谓技术官僚、事务型官员的尝试，同时也推动了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小政府”“弱政府”模式逐渐向“大政府”“强政府”演变的发展趋势。[④]

以计学馆为代表的部门学馆，培训本部司员学习业务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做法，也遭到了不少攻击。胡思敬曾听到吏部官员私下议论：“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胡认为这是士大夫“保全禄位”的行为，“其卑鄙大率类此”。[⑤] 清政府推行新政，各

---

① 《度支部计学馆之变通》，《新闻报》1909 年 8 月 11 日第 3 页，《中外要事》。

② 《度支部计学馆毕业学员名单》，《时报》1909 年 8 月 15 日，第 1857 号，第 3 页，《要闻》。

③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39–254 页。

④ 关于政府职能转换问题，参考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⑤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1，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2 页。

种改革举措不能说立意不良，但在具体执行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偏差。整顿部务之时，司员需要亲自拟稿。对此，工部主事孙宝瑄戏谑道：“今日之政府，所谓以振作为敷衍者也。昔有再醮之妇，嫁续娶之夫，人赠以一联云：又是一番新气象，依然两件旧东西。可以为今日政府写照。”① 可见，其并不认为部务整顿是变革政治的有效办法，并对政府无甚信心。联系到前述计学馆札记功课中，贵州司员外郎恒年的遭遇，或更能说明转型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无比复杂与微妙。

References

Chen Mi. *Chenfuchen nianpu*(The chronological life of Chen-fuchen), in Chen Depu, ed. *Chen Fuchen ji*(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Fuchen),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95.

Guan Xiaohong. *Wanqing xuebu yanjiu* (Studies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Guangzhou: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2000.

Luo Zhitian. “Geming de xingcheng: Qingji shinian de zhuanzhe (shang) ”(The formation of th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en yea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ndaishi yanjiu*(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3)2012.

Xiao Zongzhi. *Houbu wenguan qunti yu wanqing zhengzhi* (Alternate civil official group and politics of late Qing Dynasty), Chengdu: Bashu shushe,2007.

Education for Officials in the Jixue Guan and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 Bao-an（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Jiangnan University; xbanq2009@163.com)

Abstract: The Jixue Guan (The College of Finance) was established on November 7, 1904, as an in-house training institution for officials under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Its mission was to “advance departmental affairs and pursue practical learning.” The college aimed to ensure that officials mastered procedural cases to gradually reduce their reliance on clerical authority, while also studying practical disciplines to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However, the college faced ongoing challenges related to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funding. After 1906, Jixue Guan gradually transitioned to more formalized operations before ultimately being replaced by Caizheng Xuetang (the College of Public Finance). Jixue Guan, along with various colleges established under its influence—such as the Shixue Guan (the College of Official Studies), Jinshi Guan (the College for Successful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and Keli Guan (the College for Training Officials)—formed a system of official education school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llectively, these institu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chools,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Jixue Guan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China’s complex transition toward modernity.

Keywords: Jixue Guan (The College of Financ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fici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Revenue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册），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30 页。